

杜甫研究三十年

——以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为中心的讨论（二）

吴中胜

三、杜诗艺术形式研究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，重视的是文学作品的人民性、阶级性，所以那些忧国忧民的作家作品得到空前关注。从这方面来说，杜甫当然也是很突出的一个。但是，这种唯思想内容的研究，忽视了艺术的本体。韦勒克把文学的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，思想内容是文学的外部研究，而艺术的本体才是作品的“文学性”之所在，内部研究即文学本体研究，他说：“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。”“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去分析研究实际的作品。经典的修辞、批评和韵律等方法必须以现代的术语重新认识和评价。”^①具体到中国古典诗词，从字法、句法到篇法、从对偶、押韵到意象的运用、情景的安排等技法，这才是中国古典诗学艺术的本体所在。古人评杜甫，固然关注其“每饭不忘君”的忧患意识，同时也推重其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、“晚年渐于诗律细”的精湛诗艺。进入新时期，学者们

对作品文学性的研究越来越重视，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探讨也日益精细。我们分杜甫诗艺整体研究、杜甫艺术的侧面研究、具体作品的艺术研究和杜甫诗艺的分体研究几个方面，来谈谈新时期杜甫艺术形式研究的新成就。

首先是关于杜甫诗艺的整体研究。先说几本专著。刘明华著《杜诗修辞艺术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版），从对仗、互文、用典、拟人、夸张、对比、叠字、构词、句法等角度切入，对杜诗修辞艺术进行了周详深入地探讨。我们这里不能不提的一本重量级的大著是杨义著《李杜诗学》（北京出版社版），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成果。本书运用诠释学的方法解读李杜诗歌，其中谈杜甫诗学部分分为“诗史”思维、叙事方式、复合意象的创造、抒情的共振原理、结构学、语句方式六章，是新时期对杜甫诗歌艺术研究的重要创获。青年学者于年湖著《杜诗语言艺术研究》（齐鲁书社版），也是这方面的专门著作。于著认为杜诗语言

作者：吴中胜，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后，341000

的总体特征：精炼性、丰富性、创造性、灵活性，并从声律、语汇、语法、修辞、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具体论述。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也持续关注这方面的研究。1981年《草堂》创刊号上刊发陈昌渠《焉得思如陶谢手——杜甫艺术修养探索之一》。陈先生认为杜甫是“别裁伪体”、善于消化吸收前代作家作品创作经验的艺术大师，这是杜诗艺术整体研究的绝好开始。之后，万云骏、赵山林《杜诗的艺术辩证法》、《续谈》（1985年第2期、1988年第4期）、蒋均涛《杜甫对诗歌形式美的确认和追求》（1989年第2期）、邝健行《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》（1992年第2期）、许总《论杜诗艺术的创造性及其渊源影响》（1995年第4期）、韩成武《以空阔显孤微——杜诗艺谈》（1996年第2期）、周田青《暮年诗赋动江关——杜甫夔州以来诗创作技巧浅析》（2000年第2期）、马德富《杜诗虚实结合的表现艺术》（2000年第1期）、朱学东《“少陵家法”与唐诗研究》（2002年第1期）、黄震云、管亚平《杜甫诗歌题目、笔法、语言与楚辞》（2003年第3期）、梁桂芳《杜甫与唐宋艺术精神的嬗变》（2007年第1期）、曾永成《“沉郁顿挫”的文本内涵和杜诗的“共振机制”》（2008年第4期）等文章，都从整体上分析杜甫的诗歌艺术，这些文章认为杜诗合乎大与细、虚与实、浓与淡、悲与喜、情与景、正与变的辩证法，杜甫反复强调并在创作中着意追求诗歌形式美，杜诗的形式美既有诗学传统渊源、家法祖训和时代氛围的共同作用，又有自己的鲜明个性。

其次是对杜甫诗艺的某一侧面的研究。这方面的研究论文非常之多，这些论

文所涉内容非常之广，有的谈杜甫诗歌的字法、词法，如沈荣森《杜诗迭字初探》（1987年第2期）、沈荣森《李杜诗歌迭字比较》（1989年第4期）、韩晓光《试论杜甫律诗中的虚词运用》（1997年第2期）、刘焕阳《诗眼与意义建构》（1997年第4期）、马德富《杜诗地名使用的艺术》（1998年第2期）、刘焕阳《表情达意 传神——论杜甫近体诗中虚字的运用》（1999年第3期）、马德富《杜诗叠字的表现艺术》（2002年第4期）、韩晓光《杜甫近体诗中的重字运用》（2004年第2期）、韩晓光、万雪平《杜甫诗歌中数词对运用探析》（2005年第2期）、韩晓光、郑昕蒂《杜甫诗歌中的特殊名词词组及其表达功能》（2006年第4期）、黄斐《杜诗中的新兴副词》（2007年第1期）、张起《杜甫诗中的数字与沉郁风格》（2007年第2期）、周远斌《以硬语“文言”——论杜甫诗文语言的突出特点》（2007年第2期），重点是谈杜甫诗歌的叠字、数词艺术和虚词的功能。有的分析杜甫诗歌的句法，如刘明华《论杜诗的句法》（1988年第2期）、刘明华《杜诗对仗的辩证艺术》（1989年第3期）、王硕荃《论“子美七言以古入律”——杜诗拗格试析》（1996年第1期）、刘明华《完善与破弃——对杜甫“拗体”的思考》（1997年第2期）、李子荣《论杜甫诗歌问句的表现功能》（2004年第2期）、张冬云《“君不见”、“君不闻”句式及杜甫〈兵车行〉的叙事方式》（2005年第3期），涉及对仗、拗格、问句，认为杜诗有诸多特殊句法，但大体以浑涵、顿挫、凝重、蕴藉为其特色。有的谈杜甫诗的用韵，如王硕荃《杜诗入声韵考》（1988年第2期）、王玉顺《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〉用韵

考》(1992年第1期)、探讨杜甫诗歌的一些用韵特例。有的分析杜诗的篇章结构艺术,如许总《杜甫“以诗为文”论》(1981年第2期)、吴明贤《试论杜甫的诗兴》(1988年第1期)、张国伟《杜甫诗中的艺术时空》(1992年第1期)、牟瑞平《杜甫以文为诗实乃以文气入诗论》(1993年第4期)、刘焕阳《语峻体健 语反意宽——论杜甫诗歌中的倒装手法》(1996年第3期)、管遗瑞《浅谈杜诗结构的顿挫美》(1997年第2期)、黄昌林《杜甫叙事诗与传统叙事的时间问题》(2001年第4期)、郝润华、王亦妮《试论杜甫的非虚构叙述形态》(2003年第3期)、林继中《论杜律铺陈排比的叙述方式》(2007年第1期)、韩晓光《意愜关 飞动 篇终接混茫——杜甫诗歌结尾艺术管窥》(2008年第4期)、重点分析杜甫诗歌的开头、结尾、倒装、时空、叙事与虚构等特殊的篇章结构艺术。有的谈杜诗的意象、命题、反讽、含蓄、顿挫等艺术或特点,如周诒谷《说杜诗的含蓄》(1983年第1期)、廖柏昂《论杜诗的“顿挫”》(1983年第2期)、徐振辉《谈杜诗的命题艺术》(1990年第1期)、丁启阵《惊心动魄之美——论杜甫的反讽艺术》(2000年第1期)、赵晓兰《略论杜甫的非写实意象——以“龙”为例》(2003年第2期)、赵超《论杜诗白发意象的情理内涵》(2008年第1期)等。总之,这方面的研究很广泛,从某种意上也可以说明杜甫诗艺千汇万状的多样风格。

第三是对具体作品艺术的分析。如钟树梁《读杜甫〈夔州歌十绝句〉》(1984年第2期)、陈昌渠《百年见存歿 牢落吾安放——说〈八哀诗〉》(1984年第2期)、成善楷《〈八哀诗〉的艺术构思》

(1985年第1期)、赵晓兰《读杜偶记——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的叙事》(1989年第1期)、刘火《〈咏怀古迹〉与〈秋兴〉里的对偶》(1989年第2期)、赖春泉《谈〈秋兴〉八首》(1994年第4期)、刘文刚《论小说体政治诗〈遭田父泥饮 美严中丞〉》(1995年第2期)等,都是这类文章。《杜甫研究学刊》几乎每期都刊有对杜甫诗歌赏析文章,这些文章也重在分析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。对杜甫诗歌艺术研究具体落实到作品,这表面上是细碎工夫,实际上是进一步理论分析的基础。古代诗论评点作家,大多落实到具体作品,少空话泛论。不像现在有些理论文章,具体作品还没有弄明白,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就建构起来了。上述几篇文章能落实到具体作品,也颇见功力。只是新时期这样的文章稍少一些,可能与新时期文学研究重理论建构而不重具体作品分析的风气有关。这几篇文章内容也较集中,如三吏三别、杜甫晚年诗,特别是《秋兴》八首,是历代诗话的必有话头,材料非常丰富。叶嘉莹先生的《杜甫〈秋兴〉八首集说》有四十多万字,但莫励锋先生说“收得还不全,里面还有遗漏。”^②可见前人对这些作品的重视程度。历代诗评都喜欢杜甫的哪些作品呢?为什么会喜欢呢?我们今天的学者可以从理论上好好分析一下这些问题。

第四是杜甫诗艺的分体研究。杜甫诗歌有所谓无体不备的美誉,新时期关于其各类诗体艺术特色的研究论文也很多。首先是杜甫的古诗,黄玉顺《杜诗古体叶韵考》(1993年第4期)分析其用韵问题。杜甫古诗又分七言古诗和五言古诗。关于七言古诗,如金启华《论杜甫的七古》(1981年第1期)、丁浩《杜甫七古

章法偶拾》(1993年第3期)作了深入分析,关于五言古诗,金启华《论杜甫的古古》(1992年第4期、1993年第1期)是一篇长篇论文,对杜甫五古诗的艺术特色论述甚详。其次是杜甫的近体诗,又分律诗和绝句两大类,先看律诗,又分排律、七律和五律。关于杜甫排律,许德楠《“铺叙感慨”的需要,诗体发展的必然——略论杜甫的排律》(2004年第2期),认为排律的使用,是杜诗扩展生活视野和完成诗体发展的产物。杜甫的“铺叙感慨”乃至“乱离叙述”,需要篇幅较长的排律,而排律具有古雅宏丽的美学价值,是诗体的发展走向,是杜甫使之发展到极致。关于杜甫的七律,研究论文最多,如雷履平《论杜甫夔州律诗》(1984年第2期)、马承五等《试论杜甫七律组诗的连章法》(1985年第2期)、万云骏《试论杜甫的七律》(1992年第1期)、尹占华《杜甫七律对仗的创新性》(1993年第3期)、许世荣《杜甫与七言律诗》(1994年第3期)、孙琴安《杜甫、李商隐七律之比较》(1994年第4期)、金启华《论杜甫的拗体七律》(1998年第1期),所涉内容也很广泛,问题的探讨也较深入。关于杜甫的五律,如孙琴安《关于杜甫五律的评价问题》(1992年第4期),对杜甫五律何以如此之多的原因、五律的主要风格和地位等问题作了分析。程建虎《浅议杜甫“四实”格五律的景联在抒情方式上的特点》(2005年第3期)则具体分析五律中的抒情方式问题。也有一些文章对杜甫律诗的一些共性和个性问题作了分析,如侯孝琼《论杜甫的连章律诗》(1996年第2期)、韩晓光《杜甫律诗对仗的语式变异》(1997年第4期)、李宇林《论杜甫秦州代笺诗的艺术特征》

(2000年第1期)、韩晓光《杜甫律诗尾联的语式特征浅析》(2000年第1期)、韩晓光《杜甫律诗词类活用及其表达功能》(2000年第3期)、韩晓光《杜甫律诗中语词的超常嵌合》(2002年第2期)、韩晓光《整中求变 动夺天巧——杜甫律诗对仗的变化例析》(2003年第3期)、兰香梅《杜甫“大拗”律诗的声律分析——兼谈杜甫拗律的归属》(2004年第3期)、葛景春《唐诗成熟的标志——论杜甫律诗的成就》(2006年第1期)等,所涉内容有连章体律诗、对仗、分时段研究、语式、词类、拗体律诗、律诗成就等方面,也是对杜甫律诗研究的新收获。关于杜甫的绝句研究,有席红《试论杜甫绝句的创新及价值》(2000年第3期)、刘曙光《论杜甫五绝的正与变》(2002年第2期)、黄震云、张英《杜甫绝句的诗学艺术》(2005年第2期)、金启华《以少胜多许——杜甫的五言绝句笺释》(2006年第1期),认为杜甫绝句在内容、写法、风格等方面都有创新,与初唐审美风尚有相符也有相异之处,正格得中,又能变化于法度之外,可谓以少胜多许。第三是杜甫的新题乐府诗,于年湖《杜甫新乐府诗的称谓艺术》(2002年第4期)、马承五《论杜甫“新题乐府”的艺术创新——以“三吏”“三别”为中心》(2004年第1期)、王辉斌《论杜甫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的诗体属性——兼及唐代新乐府的有关问题》(2005年第3期)等文章作了深入研究,特别是围绕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的相关问题展开论述。20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关于这两组诗的研究,重在研讨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,认为这两组诗是杜诗具有“人民性”的例证,而新时期则重在研讨其艺术体式问题,从这一个侧

面也可以见出学术研究的时代变迁。

四、杜甫其他文体研究

人们一谈杜甫，往往只谈其诗，在普通人的眼里，杜甫也只是一个诗人，历史上杜甫也不以文名。鲁迅就说过：“杜甫的诗好，文章也就不行。”^③其实，杜甫所作其他体式的文章也不少，特别是所作赋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影响了杜甫的命运。为了全面了解杜甫，新时期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努力。关于杜文的研究，1981年《草堂》创刊号发表刘开扬的《杜文窥管》又连续撰写了《杜文窥管续》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（1982年第1期、1982年第2期、1983年第1期、1983年第2期），就是这方面新开拓。刘开扬首先以串讲的方式分析了《进三大礼赋表》、《朝献太清宫赋》、《朝享太庙赋》、《有事于南郊赋》、《进封西岳赋表》、《封西岳赋并序》、《进雕赋表》、《雕赋》、《天狗赋》、《画马赋》等赋表类文章，又分析杜甫的杂著文章，其中有《祭远祖当阳君文》、《祭外祖祖母文》、《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》、《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》、《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》、《杂述》、《秋述》、《奉谢口勅放三司推问状》、《为补遗荐岑参状》、《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》、《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》、《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阁画太乙天尊图文》、《唐兴县客馆记》、《说旱》、《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》、《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》、《东西两川说》、《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》、《少陵诗序》、《假山》、《种萋萋诗序》、《八哀诗序》、《园官送菜诗序》、《课伐木诗序》、《同元使君舂陵行序》、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》、《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却赴通州

序》、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序》等，所涉文体有祭文、墓志、神道碑、述、状、策问、记、说、表、序等多种。刘开扬说：“世人每读杜诗而厌读杜文，以为非其所长，于我何益，盖未深思耳。杜文与太白、独孤及诸人之文亦四杰之后、韩柳之前文章发展之里碑也，平实而论其得失，则知陈师道之论亦不过如杜所云‘今人嗤点流传赋’（《戏为六绝句》），而杜文正所谓‘当时体’，陈振孙所谓‘开元以前文体大略如此’也。欲知文章发展之历程者，不可不读杜文也。”他认为杜甫杂著题较多，内容较为丰富，为了方便读者，他作了较详诠释。这一组文章是新时期对杜甫其他文体研究的重要收获，也一下子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高峰。也许是这一组文章研究的深细，乃至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以后多年不见有文章涉及这方面问题。

进入九十年代，这种局面有所改变。刘和椿《读杜文札记二则》（1990年第2期）分析了杜甫《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》、《东西两川说》认为二文提出了安边治蜀的方略，表现了诗人的政治才干。郭维森《杜甫的赋》（1991年第1期）认为杜甫很重视赋体的写作，从文体的交叉影响看，杜甫的赋也多有与诗篇相通之处。刘文刚《论杜甫的赋——兼及杜甫赋与诗的比较》（2000年第4期）杜甫在内容与形式上都穷力追新，思想深刻，内容厚重，具有鲜明的特色，将叙述、议论、抒情、想象融为一体，形成一种特殊的笔调，自由挥洒，变幻莫测。本文还特别指出了杜甫赋的不足之处，一是未能表现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主流；二是形式上有太多创新，不符合赋的流行色；三是不具备赋的主流特色，无法引领

时代潮流。在杜诗与杜赋的关系上，刘文认为，两者在创造性的创作方法和浪漫气质等方面是相通的，与其他文章只是一味说好话不一样，本文的观点虽有苛刻之嫌，但总的来说，是客观公正的。刘朝谦《杜甫赋文心迹与赋论、赋评》（2002年第2期）则把作品和理论联系起来谈，认为杜甫的赋文风格以刚健、壮大为主，他的赋论、赋评在理论上基本没有什么创新之处，但他的赋文风格范畴“沉郁顿挫”，却是他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贡献。郭院林《俊异意象背后的悲情——试析杜甫〈雕赋〉与〈天狗赋〉》（2003年第1期）从意象的象征性入手，指出两篇赋的独创性与悲剧性。邝健行《从唐代试赋角度论杜甫〈三大礼赋〉体貌》（2005年第4期）一文的视角独特，认为《三大礼赋》也算是试赋，主考官就是玄宗，风貌与当时流行赋有所分别，读来古意盎然，可能会引致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。杨经华《生存的困境与文学的异化——杜甫诗赋比较研究》（2006年第4期）将杜赋与杜诗比照对读，发现杜赋充满着大量歌功颂德的词语，与杜诗的现实批判精神形成强烈的反差。这种反差产生的原因，作者认为，除了献赋媚上是普遍行为外，杜甫生存环境的恶化，生存的压迫造成了他急切献赋的内在动因。詹杭伦、沈时蓉《〈越人献驯象赋〉与杜甫关系献疑》（2007年第4期）一文从多方面考证认为，根据现有材料，此赋是否杜甫所作，尚不能确认，应该保持存疑的审慎态度。韩成武、韩梦泽《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》（2008年第3期）一文认为，杜甫献赋后，经过中书省考试，获得出身，没有立即得到官职，是唐代铨选制度决定的。总之，20世纪90年代以

来，关于杜甫其他文体的研究日趋深入，特别是对于杜赋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，日益成为学者感兴趣的话题。相信，随着人们学术视野的不断开阔，新资料的发掘和运用，相关研究会得以进一步拓展。

五、地域研究

新时期杜甫研究的一个重要亮点，就是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开展和逐步深入，随着这些年旅游与文化关系的日益紧密，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日中天。我们知道，杜甫一生到过许多地方，每到一地都有诗歌，因而他的诗有“图经”之美誉。各地自然山水、风土人情会在他的笔下留什么印迹，甚至如何影响他的诗风诗貌，杜甫的许多人生重要关节点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地等，这些都作地域性的考察。前文所说的张忠纲、綦维、孙微著《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》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收获。杜甫研究会组织的多次影响很大的学术研讨会，其地域性就很强。议题较为集中、影响较大的几次研讨会：1984年4月，杜甫草堂召开了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，对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讨论。这是《杜甫研究学刊》较早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杜甫地域研究的一次重要活动。1986年4月，杜甫草堂召开了杜甫两川诗学术讨论会，许多学者就杜甫两川诗的地位、杜甫入蜀和去蜀的原因、与严武、高适两人的关系、在两川时的情绪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。1988年5月，以纪念杜甫入湘1220年为契机，在湖南省平江县召开“杜甫在湖湘”学术讨论会，对杜甫在湖湘阶段的诗作及杜甫卒葬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。1998年，杜甫草堂召开杜甫与西域文化研讨会，探讨杜甫与西域文化的关系。1999年10月，在湖北襄樊召开杜甫与襄阳学

术研讨会，大会特别对杜甫的先祖和祖籍、杜甫与诸葛亮、杜甫的出生地等问题进行了研讨。以这些地域性的专题会议为龙头，新时期杜甫地域性研究开展得红红火火。下面，我们分几个讨论比较集中的主要地域来谈谈这方面的研讨。

首先是秦州地区，主要文章有李济阻《杜甫在秦州的生活及其对创作的影响》（1997年第3期）、聂大受《试论杜甫秦州咏物诗的个性化特色》（1998年第1期）、童强《论杜甫秦州诗的特点》（1999年第1期）、李宇林《试论杜甫秦州代笺诗的艺术特征》（2000年第1期）、李宇林《从秦州诗看杜甫的人才意识》（2001年第4期）、聂大受《从秦州诗看杜甫诗歌创作的转变》（2002年第2期）、聂大受《杜甫秦州咏物诗二题》（2002年第3期）、李宇林《试论杜甫秦州咏物诗中的生态环境美》（2002年第3期）、李济阻《杜甫陇右诗中的地名方位示意图》（2003年第2期）、聂大受《杜甫陇右诗及其陇右地域文化背景》（2006年第2期）、孙启祥《〈泥功山〉属秦州纪行诗吗？——兼论杜甫秦州、同谷纪行诗并非各为12首》（2006年第4期）、李宇林《从陇右诗看杜甫的人生悲剧》（2007年第1期）等。比较集中的话题，首先是这一时期咏物诗的讨论，聂大受认为，秦州咏物诗多咏弱小细微或病残废弃之物，多是对自身的感伤和咏叹，具有内向性的特点，且多以组诗和意象群体来表现。在内容题材上由君国转向了自我，由社会转向了自然，诗体上着力于五言律诗，凸显“沉郁顿挫”诗风。李宇林则认为，杜甫这一时期的诗体现了生态环境美，那良好的植被，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，洁净纯美的水体，无不给人以美的愉悦和美的享

受。至于陇右诗，学者们认为，与陇右地域文化背景关系密切，从这些诗可以看出杜甫三个层面的人生悲剧：价值取向悲剧、生存悲剧和隐逸悲剧。

其次是两川时期，代表性的文章有钟树梁《杜甫两川诗略论》（1987年第1期）、陶道恕《子美集开新世界——杜甫两川诗管见》（1987年第1期）、许世荣《沉吟呜咽 满纸悲风——试说杜甫两川诗所流露的悲观情绪》（1987年第1期）、陈昌渠《自笑狂夫老更狂——杜甫草堂风情的一点思考》（1987年第1期）、王定璋《杜甫两川诗蠡测》（1987年第1期）、曾亚兰《杜甫蜀中诗所表现的情感生活》（1987年第1期）、张忠纲《论严杜交谊与杜甫之去蜀》（1987年第2期）、《杜甫与巴蜀文化》（一、二）（1990年第1、3期）、毛明文《杜甫阆州行踪及创作》（1997年第4期）、胡继琼《杜甫入蜀山水诗之风貌》（2002年第2期）、李智勇、左启《少陵胜迹梓州多》（2002年第3期）、陶喻之《试论杜甫“蜀道难”诗》（2002年第4期）、周睿《浅论杜甫入蜀纪行诗歌特色》（2003年第1期）、陈子建《杜甫草堂诗疏野风格的形成及其特征》（2004年第1期）、张宗福《杜甫寓居草堂心态与草堂诗的生成》（2006年第2期）等。这些文章就以下方面展开探讨：关于杜甫两川诗的地位，学者们认为，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涵育至富，迹象难求，不拘一格，显示杜甫在诗歌创作上跃上了又一个新的高度，开诗境新世界；关于杜甫入蜀和去蜀的原因，张忠纲认为，杜甫是在严武死后，生活无所依，又预见到蜀中将乱，才离蜀出峡的；关于杜甫在两川时的情绪心态，许世荣认为，老杜两川诗中，有很大一部分诗作表现出

一种悲观低落情绪。曾亚兰认为，杜甫草堂诗反映出杜甫此时淡泊心情、与物同乐的志趣，只是他激愤忧郁情绪的暂时缓和。张宗福认为，杜甫寓居成都草堂的心态非常复杂，从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其时诗歌内容的多样性。陈子建认为，疏放质朴、萧散逸野是杜甫草堂诗的主要风格。

第三是夔州地区，白航《谈杜甫笔下的夔州景物风俗诗》（1982年第2期）较早就注意到这一时期诗歌中反映的景物与风俗。卞孝萱、乔长阜《杜甫的〈夔府歌〉与刘禹锡的〈竹枝词〉——兼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原因》（1983年第2期），则较早关注它们的艺术特色。由于夔州会议的召开，1984年和1985年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连续刊发了一系列关于杜甫夔州诗的论文。主要有：屈守元《从几个小统计看杜甫夔州诗创作的一些问题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王达津《试论杜甫夔州诗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祁和晖、谭继和《杜甫夔州诗中反映的民族问题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裴斐《杜诗风格与夔州风土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马德富《杜甫夔州诗风格的正与变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王启兴《杜甫入峡诗中所表现的自然美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雷履平《论杜甫夔州律诗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钟树梁《读杜甫〈夔州歌十绝句〉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王仲镛《在夔州精心结撰的一组史诗——杜甫〈洞房〉八首浅谈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许永璋《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——论杜甫〈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〉的卓越成就》（1984年第2期）、曹慕樊《杜甫夔州诗及五言长律的我见》（1985年第1期）、陶道恕《乃知盖代手 才力老益神——杜甫夔州诗偶记》（1985年第1期）、曾枣庄《巫

山巫峡气萧森——读杜甫夔州山水诗》（1985年第1期）、朱碧莲《形胜有余风土恶 哀哀血泪化诗篇——读杜甫夔州诗》（1985年第1期）、杨铭庆《杜甫夔州咏雨诗初探》（1985年第1期）、刘尚勇《杜甫夔州诗例释》（1985年第1期）、许总《艰难诗万首 夔府至今名——杜甫夔州诗评价之我见》（1985年第2期）等。一时间，对杜甫夔州诗的研究进入高潮。之后，这方面的文章也陆续出现，如郑宏华《登临多物色 陶冶赖诗篇——浅谈杜甫的夔州山水诗》（1986年第1期）、蒋先伟《文人竹枝词的开山——〈夔州歌十绝句〉——杜甫、刘禹锡学习民歌竹枝词的比较研究》（1991年第3期）、白敦仁《略论〈夔府咏怀一百韵〉的立意和行气》（1994年第4期）、沙先一《试论朱熹对杜甫夔州诗的评价》（1998年第3期）、蒋先伟《如何评价杜甫夔州诗的风土人情描写》（2002年第3期）、李江《谈杜甫夔州诗中的“赤甲白盐”》（2004年第3期）、周建军《从夔州物候民俗诗看杜甫之“仁”》（2005年第1期）、王大椿、李江《杜甫夔州高斋历代考察述评》（2005年第2期）、刘书东《杜甫夔州诗景观淹没寻绎》（2006年第4期）等。这些文章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开展：一是自然山水，二是风土民俗，三是诗歌特色及其评价。主要观点认为，这一时期的杜诗描写了夔州奇特的山水，也促成了杜甫这一时期山水诗既不同于中国历代的山水诗，也不同于他此前的山水诗，沉郁而悲凉；针对有学者对“形胜有余风土恶”的误解，蒋先伟对夔州的气候与环境、夔州的种族、好巫信祀的原始宗教崇拜，夔人的“器量窄”和“疏北客”等三个方面辨析了杜甫不喜欢夔州风土人情的原

因。有几位学者还注意到这一时期杜诗与民歌的关系，这是很有见地的。

第四是湖湘地区，这是杜甫诗歌的最后阶段。主要文章有羊敬德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——杜甫在湖南诗作中的联想》（1986年第1期）、钟树梁《论杜甫荆湘诗》（1988年第2期）、丁浩、周维扬《杜甫荆湘酬赠送别诗琐议》（1988年第2期）、丘良任《杜甫之死及生卒年考辩》（1988年第2期）、梁文忠《略谈杜甫的死因及平江杜墓》（1988年第2期）、曾亚兰《杜甫荆湘诗的忧患意识》（1988年第4期）、成善楷《杜甫湖湘诗笔记》（1989年第1期）、熊志廷《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——杜甫湖湘诗述略》（1989年第1期）、刘洪仁《人民性的光辉总结——也谈杜甫湖湘诗的主调》（1989年第1期）、祁和晖、熊培庚《谈杜甫漂泊湖湘的酒诗》（1990年第3期）、李一飞《杜甫流寓湖南行事考辨三题》（2004年第1期）等。这些文章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：钟树梁认为，杜甫两年多在湘湖却创作了一百多首诗，精神可贵，艺术上意境深微，各体诗均属上乘，五言律诗尤感人心。在诗歌内容上，学者们认为，这一时期杜甫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仍是主调。至于杜甫生卒年，丘良任经考证认为，杜甫生于先天二年癸丑，卒于大历六年辛亥，卒地是湖南昌江寓所。梁文忠认为，杜甫是系患风疾而死，平江杜墓系真墓。而李一飞认为，不可小视、不可置信溺死说，杜甫卒于大历五年。现在看来，对杜甫卒葬问题的讨论多为旁证推论，有待更为确切的材料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讨。

对其他地区，新时期也有不少地域研究方面的成果出现。如西域地区，有刘明

华《杜诗中“胡”的多重内涵——兼论杜甫的民族意识》（1999年第1期）、王德亚《杜诗关于汉胡战争蠡测》（1998年第4期）等文章，刘明华认为杜甫的民族意识之有无，要放在唐代的具体历史背景中去分析。杜甫在诗中表现出汉族文化是主流的意识，但他对“胡族”有一种难得的宽容态度。乔长阜《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——兼谈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》（1997年第4期）一文探讨了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。钟树梁《试论杜甫长安十年诗》（1994年第4期）、李小琳《长安曲江与杜甫曲江诗》（2007年第4期）两篇文章分析了杜甫长安诗。刘志清《诗圣杜甫的首阳情结》（2002年第3期）认为杜甫视洛阳为第二故乡。（日）上田武《杜甫在东鲁时期与李白的交往与诗作》（2004年第1期）则谈东鲁时期李杜的交往。这些文章都紧扣地域角度来展开论述，注意地域山水风情与诗人诗作的关联。（未完，待续）

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《杜甫批评史》（08JC751007）的阶段性成果。）

注释：

- ①〔美〕勒内·韦勒克、奥斯汀·沃伦撰，刘象愚等译《文学理论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。
- ②莫励锋《杜甫诗歌讲演录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。
- ③邓哲《谈鲁迅对杜甫的态度》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1990年第1期。

责任编辑 刘晓凤